

同一个日本人，滞留上海的日本青年“杉”，每部小说都出现了一个女性人物，一个是《审判》中“二郎”的未婚妻“怜子”，一个是《蝮蛇的后裔》中的女性“她”。然而，《蝮蛇的后裔》中的“她”和“她”的丈夫，作为小说的关键人物既没有姓氏也没有名字；这不得不让我们对小说家武田泰淳在此处似乎不着痕迹的手法心生疑窦。思想家竹内好在解说武田泰淳的评传《司马迁》时曾评价说：“在假托他人而言说自己这一点上，武田泰淳是一个才能出众的睿智之人。”<sup>[10]</sup>那么，反观武田泰淳从战前至战后的人生轨迹、文学轨迹，钩沉他的战争体验、中国体验，再把《蝮蛇的后裔》中各色人物间爱与被爱、加害与被加害、求助与被助、复仇与被暗杀的关系与之进行比照分析，便可发现一个文学手法上显而易见的隐喻性象征的存在；那就是“杉”、“她”、“她”的丈夫、“辛岛”与武田泰淳、中国、中国文学研究会、日本军国主义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因为，武田泰淳思想中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精髓，常常被他比喻成数次遭受奸淫、富于反抗精神的成熟女性；武田的这种说法在他与古林尚、堀田善卫、竹内实等人的对谈语录中随处可见，并且这种理论思想早在1948年就已出现在他的随笔《关于灭亡》中。在此仅举一例以为佐证：“相比之下，中国的灭亡体验，简直深不可测。中国看起来就像是一位经历数次离婚、数次被奸淫，最终被养育成拥有复杂、成熟情欲的女性。可以说，中华民族看似无抵抗的抵抗源泉，正在于这一成熟女性引导无数男人的自信力量。”<sup>[11]</sup>武田泰淳的这种论断，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确信《蝮蛇的后裔》中“她”与“中国”之间象征性的对应关系。

《蝮蛇的后裔》中的病人，即“她”的丈夫是否能够联系到“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一学术团体上，我们还需要依据武田泰淳本人的相关叙述加以论证。1975年7月，武田泰淳与竹内好的对谈录《“中国文学”时代》发表于学术期刊《展望》；武田泰淳在谈及“中国文学研究会”早期同人梅村良之病故前的情景时说：“听说他将不久于人世，新年的时候正好我去了茅崎。他躺在病床上，看到我来了便说：‘研究会的同人能来看我，真是感激不尽’，说这些话时他泪流满面。实际上，我并非特意去梅村那里，只是顺便去了茅崎而已；他病得很厉害，身体虚弱、消瘦得像一块干巴巴的饼干。那次，他还提到了你（竹内好）。他说：‘竹内是个严厉的人，我不凑齐会费，他一定会批评我的；会觉得我在研究会伙伴中掉了队而感到遗憾吧’。所以，后来我把梅村当时泪流满面的样子写进了《蝮蛇的后裔》这部小说，用来描写将死的病人的表情。梅村良之去世后，他的哥哥还曾把梅村的会费寄到我们研究会里。”<sup>[12]</sup>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仅《蝮蛇的后裔》中“她”的丈夫的原形有“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梅村良之的影子；就其象征意义来说，在武田那里，“她”的丈夫就是彻头彻尾地代表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因此，无论是依据《蝮蛇的后裔》中的人物关系，还是凭借武田泰淳文学叙述的蛛丝马迹，都可以证明这种基本能够一一对应、并近乎于珠联璧合的镶嵌式关系；这不仅印证了小田切秀雄和岸本隆生对《蝮蛇的后裔》中人物象征性解读方法的合理性，也基本符合竹